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

领的这支考古队一行五人，除他以外，都是中国人。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进行工作的考古队，因此，他们的工作方式必然与那些进行破坏性挖掘的西方人迥异。

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起步。

证明中华文明如何起步

据安特生于1934年出版的《黄土的女儿》（英文版）回忆，1921年4月18日，由刘长山带领，他们一行五人，来到澠池。

当时的澠池县知事胡毓藩到车站迎接。站在胡毓藩身旁的，是澠池县城西关基督教福音堂的牧师史天泽。这也是一位瑞典人，1905年就来到中国。胡毓藩请史天泽担任翻译，并让安特生一行下榻在福音堂。

胡毓藩指定澠池县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外加警察护送，安特生一行于4月21日来到仰韶村。他应该就是在这天在村南捡到陶片和石器的。一行人在村中大户王兆祺家住下，然后开始了为期八天的考察。这八天里，安特生每天忙于观测、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冲沟断面上发现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的下层还发现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又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一件石镞和一些彩绘陶片。安特生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和部分骨器、蚌器装为4个木箱，用火车托运回地质调查所。《新民周刊》记者从仰韶文化博物馆负责人侯建星处了解到，当年这八天的考察，让安特生对仰韶村的情况有了较为



直接的了解。之后，这一行人显得小心翼翼，并没有立即开掘，而是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科学论证。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起草了一份发掘报告，送交农商部总长张国淦和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张国淦批复同意安特生报告，并安排丁文江具体操办。“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又取得河南省政府的同意和澠池县政府的支持，1921年10月23日，安特生再次来到仰韶村，仍住进王兆祺家，准备对仰韶村进行正式发掘。参与这次发掘的还有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外籍专家步达生、师丹斯基等。”侯建星表示，“1921年10月27日，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正式开始，全部发掘工作至12月1日结束，历时36天，先后共开掘17处挖掘点，陆续出土大量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遗物。发掘结束后，他们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立了一个小木牌，上书‘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

上图：位于三门峡市的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该馆一大亮点就是在展出的数千件文物中，没有一件彩陶的样子是相同的。图为形状各异的陶器。

毫无疑问，1921年的这个发现，是惊世的。在仰韶文化被科学发现之前，中国知识界有一种说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新石器时代，亦即中华文化是彻底自西方而来。在经历了1840年被坚船利炮摧开国门，之后又经历种种屈辱的中国，“中华文化西来论”开始流行。而尽管在安特生挖掘出仰韶村遗址的许多遗物后，仍在假设“中华文化西来”，可起码仰韶文化证明了在夏商周之前，中国存在新石器时代。

安特生之所以假设中华文化西来，是因为他觉得仰韶文化和当时的俄国中亚地区出土的安诺遗址有相通之处。1923年，安特生在《中华之远古文化》一文中，对此做过比较。安诺遗址位于如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地区，1903年，美国人庞佩利在古稀之年，获得沙俄政府准许，前往中亚，发掘出这一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并存的遗址。由此证明中亚是人类农耕